

创新中国文论正当其时

刘方喜

理论创新往往来自社会生产方式的新变和转型。在当下由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引发的文艺形态变革中，中国文艺理论迎来自主创新重大机遇，需要我们增强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积极推动理论转型发展

新技术正在改造物质生产方式，并与包括文艺在内的精神生产日趋融合，那种割裂与物质生产的联系而孤立谈文化艺术问题的理论范式，将越来越缺乏解释力，而充分结合物质生产来探讨精神生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力越来越强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信息技术、文艺实践牵引下，在社会文化潮流带动下，中国文艺理论经历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等，当前正经历关于新技术转向的探索。在当下由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引发的文艺形态变革中，中国文艺理论迎来自主创新重大机遇。与此同时，中华民族正在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构建与中华民族强起来和全球发展新趋势相匹配的文艺理论创新体系，成为新的时代使命，而新技术转向将助推我们完成这一使命。

西方旧理论无法解释中国新实践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新技术转向正在引发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理论范式转型，但很多研究者至今仍乐此不疲地操持后现代主义话语，没有意识到这些后现代文论作为上一轮文化转向的产物，对新的社会实践已越来越缺乏解释力。

与语言转向、文化转向、新技术转向相伴的是现代信息技术的三次革命：一是与语言转向相关的现代印刷技术，促进文化艺术大众化、民主化；二是与文化转向相关的电子信息生产、传播力，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信息生产、传播、接受形态——新的文论建构必须能有效回应这种形态改变。

从媒介看，以上三次转向又表现为由纸质（文字）媒介、电子（音像）媒介向互联网数字媒介演进。产生自文化转向的西方后现代文论，主要建立在电视媒介基础上，比如麦克卢汉《理解媒介》所讲的“新媒介”主要就是电视，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就建立在这种范式上。互联网已经为我们超越这种范式提供现实媒介技术基础，然而现在对互联网文化的讨论往往还在运用旧的电视范式，文化批评虽然也开始关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但总体来说，研究对象是新的，所运用的理论范式却依然是旧的——进一步推动文论基本范式转型，还需做更细致、深入的辨析和反思。

新技术转向更需历史唯物主义指引

技术变革首先带来文化艺术生产内部生

态的巨变，引发文化主体范式转型。大众在文化活动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文化转向中的重要议题。文化转向主要关注的是大众在文化消费中的作用，因此，与电视范式相应的大众主体范式主要是消费者范式。而到了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web2.0尤其是智能手机普及阶段，大众通过智能手机可以把编辑、改编乃至自创文艺信息发布到社交平台上，由此大众也成为文化生产主体或“产消者”。如果说电视带来大众文化消费变革的话，智能手机等则带来大众文化生产变革；作为“产消者”的大众开始参与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信息生产流转各环节、全过程，并逐步对社会文化生态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更前沿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使智能机器也正在成为“生产者”——文化转向中单一的消费者范式研究与当下这些新社会文化现象已越来越不匹配，主体范式的变化必将对文化艺术生产、传播、评价等造成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充分认识大众文化主体向“生产者”或“产消者”的转型，已成为文艺理论发展新的现实需要。

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还关乎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广泛社会生活领域，给文化艺术的外部生态带来巨变，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反思文化转向存在的某些不足。第一次语言转向作为所谓“向内转”，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尤其物质生产讨论文艺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方向；第二次文化转向虽是“向外转”，但这里的“外”总体上不包括经济活动尤其物质生产，这一转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偏离倾向并未改变。今天可以扭转这种偏颇的重要社会实践基础是：在新技术转向中，包括文艺在内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出现更高层次的融合。

文化艺术生产内外生态的巨变，呼唤文论基础范式的转换。当下新技术正在促使信

息技术与物质生产日趋融合：互联网web2.0技术进一步发展，使不同于“信息”的“物”融入互联网从而形成“物联网”，引发物质生产方式革命，3D打印机等成为重要生产工具。如果说智能手机只是使大众掌握精神生产资料而在数字世界中生产符号产品，那么3D打印机则使大众一定程度上拥有物质生产资料而可以在现实原子世界中生产物质产品。当今新技术不仅在改造大众文化生活，而且在影响大众经济生活，革命性地改造当今物质生产方式，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更受重视的原因，也是我们超越西方文论轻视物质生产而就文化论文化、就符号论符号等倾向的现实立足点。

先进技术发展为文论创新提供重大机遇

如果说在语言转向、文化转向中，中国文论或多或少存在“跟着西方讲”的不足，那么，在当下新技术转向及其引发的文化艺术新变中，中国文论将迎来自主创新重大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理论创新往往来自社会生产方式的新变和转型，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改造当今全球物质生产方式，并与包括文艺在内的精神生产日趋融合，文化转向中割裂与物质生产联系孤立谈文化艺术问题的理论范式将越来越缺乏解释力，而充分结合物质生产探讨精神生产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力必将越来越强，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优势，也是我们的理论自信所在。

其二，在文化转向相关的电视文化发展上，中国较西方有所落后，而在与新技术转向相关的互联网、智能手机普及和应用上，中国

与西方基本同步，是世界瞩目的互联网大国，这是我们推进文论自主创新的文化技术基础。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已取得较大成绩，并在海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网络剧、连网网上网下的IP影视等文艺新形态正在快速发展；如何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入文艺尤其网络文艺的创作传播中，已开始被高度关注——进一步锻造与新技术相融合的更先进文化生产传播方式，将是中国文化艺术自主大发展的关键。在此基础上，需要我们更新文艺观念和批评方式，建构与之相匹配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诸如利用大数据分析文艺发展、传播状况和趋势，探索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如何融入文艺创作、传播、评价过程，从而提升文艺的生产力、传播力、引导力等，都是中国文论进一步创新发展的问题抓手。

其三，新的技术转向带来社会生活领域广泛变革，这将为中国文化艺术自主发展和文论自主创新奠定越来越坚实的物质基础。“文运国运相牵”，文论创新发展也与国运相牵。在当今全球新技术范式大转型中，我们的国运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华民族正在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这正是当下世界文论发展过程中，中国文论自主创新、坚定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但诚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往往落后于经济基础变革、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技术转向中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按摩尔定律呈现指数级增长，已经并将更深刻地改变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与这种指数级速率相比，当今文艺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普遍显得滞后。因此，在自觉深刻反思基础上，更新观念，推动新技术转向和文论范式新转型，就不仅仅是增强理论和文化自信的需要，更是顺应全球发展新趋势的现实需要。在全国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在历史传承中推进自主创新，中国文论必将大有可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留住语言多样之美

杨 早

艺海观澜

共同语增强我们对共同体的认同，而无数的方言词语奔涌、融汇到我们的语言视野与文学教育之中，成为共同语保持活力的源泉

上海小学教材里的“姥姥”“外婆”之争已经落下帷幕。上海市教委责成其教研室与上海教育出版社迅速整改，向作者和社会各界致歉，并将教材中的“姥姥”改回“外婆”。

教材编纂方擅自替换选文用词确有不妥，但此事之所以引起热议，还与教委对一位家长来信的回复联系在一起。这位家长针对小学生《寒假生活》中出现“姥姥”一词不满，认为“这是上海不是北方，孩子无法适应，也无法理解”，而上海市教委答复里称查《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姥姥”是普通话语汇，“外婆”“外公”属于方言。正是这句话将“姥姥”“外婆”之争推向风口浪尖。

“姥姥”和“外婆”到底谁更“正宗”，谁是普通话语汇，谁是方言？针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基础性知识应当成为讨论前提。比如，“北方叫‘姥姥’，南方叫‘外婆’”听上去符合生活经验，却远不够准确，“外婆”的使用范围南北地区均有，西安许多人就使用“外婆”，而“姥姥”的使用地域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内蒙古至河北、山西北部，还有山东与河南的部分地区。其次，既然是文章中用词，那还应该跳出

口语，从书面语的角度考察。翻检北京话代表作老舍的著作，“外婆”使用次数数倍于“姥姥”，在典范白话文形成的语境中，“姥姥”的地方色彩反倒比“外婆”更突出。再次，对于外祖母的地域性称谓并不只有“外婆”“姥姥”两种，还有“外奶”“姥娘”“家婆”“阿嬷”等诸多叫法，并不是非此即彼那么简单。

这次争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度语言问题何其复杂，不同语言既鲜明地体现不同地域文化，也因为历史变迁而相互交融、相互影响。这一

事件最让人感慨的地方，是上海市教委答复中提出的“希望学生利用寒假适当了解祖国语言的多样性，进一步开拓视野，增长知识”。如此初衷算得上美好，值得肯定。忆及上世纪80年代，正是现实主义叙事与地域书写的黄金时代，文学期刊里的小说、散文，没有方言、没有地域色彩的少。从这些文学作品里，我们认识了王安忆、陈村、程乃珊笔下的上海，邓友梅、陈建功笔下的北京，冯骥才、蒋子龙笔下的天津，还有张一弓的河南，张贤亮的西北，汪曾祺的高邮……这种从方言到

地域文化的文学教育，使得我们在走出家乡、接触多样地域文化时，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也能更平等地看待和欣赏不同地域之美。粽子甜的咸的肉的，豆腐脑甜的咸的辣的，都很好吃，为什么要拒绝更丰富多样的体验？语言文学同样如此，不拘南北，用地道语言恰切地描摹不同地域的万千风姿，同样可以实现费孝通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规范化、普适化，以及标准语汇和标准语法的持续推行，将保证受教育者都能文从字顺地写作。但符合标准、规范与保持语言的鲜活感、敏锐度并不相悖，更不该成为文学书写的乏力托辞。汪曾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论断，值得今天的作家们深思。现在有一些小说只是满足于给读者呈现一个通顺的、完全不存在阅读障碍的“故事”，而不是绘声绘色、洋溢地域色彩的个性化叙事。地域色彩越来越淡，一个表征就是如今的文学期刊与小说单行本中，几乎见不到对方言或风俗的饶有趣味的注解。

罗素说，“须知参差多态，方是幸福的本源。”跟喜欢各地地道饮食一样，很多人喜欢听各地人游刃有余地讲本土方言，借助这种语词的力量，再平凡再普通的人也能一下子焕发生命光彩，甚至可以说，灵魂在自己的语言中找到了家园。江南的糯，西部的犷，巴蜀的脆，北方的刚，需要不同地方的耳朵与心灵去品尝回味。语言是流动的历史。以普通话为代表的共同语增强了我们的集体认同，凝聚了我们的文化创造力，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无数的方言语词奔涌、融汇到语言视野与文学教育之中，成为共同语保持活力的源泉。

如今看来，值得庆幸的是，几十年来我们大多数昆曲人并没有放弃，没有逃避、畏惧过迎面的挑战，更没有想过“坐吃山空”或是“等靠要”。守住昆曲艺术的根本、坚持出人出戏是我们从未放弃的努力方向。剧团的生存、发展和剧种的命运休戚相关。而剧团得以生存且发展下去的唯一方法就是出人出戏：优秀的人才和优质的剧目缺一不可。近年来“一团一策”的推行正是针对艺术团出人出戏这一诉求的“诊脉良方”。“望、闻、问、切”，唯有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才能真正找到“病灶”，进而从“一团一策”细化到“一戏一策”“一人一策”，从而解决艺术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如是才是科学的、合理的、符合艺术规律的发展思路，同时也能做到对艺术从业者的尊重。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好政策并不是艺术发展一劳永逸的守护神，不是让戏曲免受外界挑战甚至伤害的温室。要长效、稳定、健康地将戏曲艺术传承下去、发展下去，始终离不开人，离不开具体从业者的努力奋斗。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路是走出来的，事业是干出来的。面对日新月异的文化大潮和当下极有利的环境、政策，我们要做的不是高枕无忧地满足现状、面对现有成绩沾沾自喜，而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危机意识，不抱残守缺，敢想敢做、敢作敢当，在尊重艺术本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昆曲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昆曲也好，其他任何剧种也罢，不仅要“活”下去，更要“活”得精彩、“活”得灿烂，这就需要我们的戏曲艺术传承者和管理者不忘初心、齐心协力，真正做到尊重艺术、尊重创造，如是，这份事业才能持久地、健康地繁荣发展下去。

（迦山采访整理）

守住昆曲艺术的根本、坚持出人出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激发昆曲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让其不仅活下去，而且活得精彩、活得灿烂



近几年，上海昆剧团明显“热闹”了许多：以青年演员为主体的“学馆制”稳步推行，几十出传统老戏得到传承和巩固；演出场次大幅度增加，几代昆曲人都有了更多展示机会和平台；票房收入、社会关注度连连提升，创造了此前想都不敢想的纪录……这一系列积极变化都与三年前开始的“一团一策”改革密不可分。

2015年下半年，在深入贯彻落实文艺工作座谈会精神、充分尊重文艺发展规律、结合国有院团实际基础上，上海市18家国有院团全面启动“一团一策”改革。此举最大的特点就是尊重每个艺术种类、每家文艺院团特点，从自身实际出发，找问题、想办法、打计划，力求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短短三年时间，上海文艺市场的整体活力、竞争力都有显著提升。

回望半个多世纪以来昆曲走过的路，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遭遇各种挑战和阻碍。但是，若没有此前许多弯路、岔路、难路甚至死路的磨砺和突围，定不会有当下及时且准确的发展政策和令人欣喜的文艺成果。在皮黄鼎盛的年代，昆曲遭遇过濒临衰亡的危机，幸亏有“传”字辈老师们的艰难支撑，才得以传承延续。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昆大班”和“昆二班”有幸在最好的年龄遇到最好的老师、学到最好的戏，一时间可谓人才济济。

1978年上海昆剧团建团后，更是将抢救列为第一要务，在“传”字辈老师指导下，几年就挖掘、整理、演出近两百出小戏，为昆曲带来从未有过的生机和活力。而后，因为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市场小、演出少、观演比例失衡等问题不断涌现，直接导致上世纪90年代人才“挤挤”的窘境。此外，我们也遭遇过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想排戏经费不够，想演戏演不起，同行和领导不理解；为争取有限的创作资源，全团上下做过无数次尝试和努力，然而纵使戏排出来了也没有多少观众，有时候台上演员甚至比台下观众还多。可以说，昆曲人几十年来酸甜苦辣尝遍，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和困难。

如今看来，值得庆幸的是，几十年来我们大多数昆曲人并没有放弃，没有逃避、畏惧过迎面的挑战，更没有想过“坐吃山空”或是“等靠要”。守住昆曲艺术的根本、坚持出人出戏是我们从未放弃的努力方向。剧团的生存、发展和剧种的命运休戚相关。而剧团得以生存且发展下去的唯一方法就是出人出戏：优秀的人才和优质的剧目缺一不可。近年来“一团一策”的推行正是针对艺术团出人出戏这一诉求的“诊脉良方”。“望、闻、问、切”，唯有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才能真正找到“病灶”，进而从“一团一策”细化到“一戏一策”“一人一策”，从而解决艺术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如是才是科学的、合理的、符合艺术规律的发展思路，同时也能做到对艺术从业者的尊重。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好政策并不是艺术发展一劳永逸的守护神，不是让戏曲免受外界挑战甚至伤害的温室。要长效、稳定、健康地将戏曲艺术传承下去、发展下去，始终离不开人，离不开具体从业者的努力奋斗。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路是走出来的，事业是干出来的。面对日新月异的文化大潮和当下极有利的环境、政策，我们要做的不是高枕无忧地满足现状、面对现有成绩沾沾自喜，而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危机意识，不抱残守缺，敢想敢做、敢作敢当，在尊重艺术本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昆曲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昆曲也好，其他任何剧种也罢，不仅要“活”下去，更要“活”得精彩、“活”得灿烂，这就需要我们的戏曲艺术传承者和管理者不忘初心、齐心协力，真正做到尊重艺术、尊重创造，如是，这份事业才能持久地、健康地繁荣发展下去。

（迦山采访整理）

蔡正仁，1941年出生于浙江南浔，昆曲表演艺术家。1961年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曾任上海昆剧团团长。代表剧目有：《长生殿》《牡丹亭》《撞钟分官》《太白醉写》《琵琶记》《见娘》《打侄上坟》等。曾获第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五届上海戏剧白玉兰表演艺术主角奖、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荣誉表演奖等。

